
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对外新闻宣传策略

王晓岚

国民党重视对外新闻宣传当始于卢沟桥事变之后。1937年7月,日本连日用英语向世界各国广播,宣传此次中日冲突原因在于中国,使世界各国深信责任真就在于中国而不在于日本。这个问题首先由鹰屋总顾问向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刘光提出,并建议说:“此种国际宣传战,中国不可忽略。”¹ 刘光在7月22日召开的卢沟桥事件第12次会议上对此做了报告。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当即指示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徐祖贻“与中央宣传部洽商,每晚增加对国际之广播,与日方对抗。”² 9月8日,军事委员会第五部成立,对外宣传工作就由该部负责筹划进行。适时战事初起,日本对外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英、美等国对中国的抗战力量估计过低,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实行绥靖政策。国民党的对外宣传针对这一点,一方面呼吁国际间主持正义,制裁侵略;另一方面大量搜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进行宣扬,以证明中国上下全体一致抗战的决心及其持久性。同年11月,第五部撤销,国际宣传处成立,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宣传部。对外新闻宣传工作便改由该处负责。1938年2月,该处又改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但编制仍以军事委员会为标准,所有工作人员均享受军人待遇。经费亦由军委会款项下拨出。

国际宣传处成立后不久即在汉口策动成立了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由该会自1937年12月25日起协助汉口市广播电台以国民外

¹ 《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13页。

² 《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13页。

交立场对国际间广播英语演讲与法语新闻。国宣处也每天派人在该台广播英语新闻,各占十分钟。此外,国宣处还派人在长沙电台担任日语播讲。

1938年5月1日,经与有关方面协商,汉口交通部无线电台每天抽出一小时供国宣处广播。该台呼号为XTJ,波长25.6公尺。广播节目有英语新闻、英语演讲、日语新闻、法语新闻、德语新闻与俄语新闻。同年10月1日停播。汉口广播电台于同年12月22日拆机西上,仍坚持在船上播音。

国宣处先遣播音员于12月中旬到达重庆后即借用重庆交通部无线电台恢复国际广播,呼号XPVG,波长26.1公尺,开始时只有英语节目,每天两次,每次半小时。12月20日,国宣处办公人员全部抵渝。该台增加了日语、俄语等节目,日播两小时。1939年2月中央广播电台建成播音后,该台停播。

1939年1月27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改进国际宣传实施方案》。1月29日又通过《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确定今后的党务发展应特别注重于海外,“而于宣传方面尤应特别注意。”¹同年3月,国民党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通盘筹划与指导国际宣传事宜。但具体的对外宣传工作仍由国际宣传处负责。

1939年2月6日,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建设的中央短波广播电台在重庆开始试播,2月19日正式播音,呼号XGOX/XGOY。该台初时由国宣处与广播事业管理处合作,每天由国宣处担任该台节目一小时,其中英语、日语各20分钟,法语、俄语各10分钟。1940年1月15日,该台奉命由国宣处管理,定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呼号依旧,发射功率35千瓦,波长25.2公尺、31.1公尺,广播时间由12小时渐增至16小时。同年7月,该台又改由

¹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54页。

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传音科仍由国际宣传处负责。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适应战时需要,其节目以新闻广播为主,其余皆置次要地位。每天各种语言及方言新闻、时论广播时间为10小时,其中每晚对南洋地区广播70分钟。

国民党的对外新闻宣传依战事之进程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对外新闻宣传,其主要目的在于争取国际间的同情与支援,所以“注重于明是非辨利害,俾中立诸强国断然下排击侵略者之决心”。¹

第二个时期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抗战胜利。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对外新闻宣传,其目的主要在于争取享受同盟国的平等待遇,提高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并稳固之及要求美英等国调整“先欧后亚”的战略步骤。

国民党对外宣传的这两个时期目的不尽相同,策略也小有差异。第一时期因为英美等国声称中立,忌讳宣传,国民党主要采取隐蔽形式,进行幕后操纵,以避免宣传的嫌疑。第二个时期英美等国参战后也重视起宣传来了,国民党不再顾忌,从幕后走到台前,公开地进行国际宣传。综合这两个阶段,国民党对外新闻宣传的策略可归纳为五点。

一 广布国际宣传网

1937年9月初,蒋介石派胡适、蒋百里分别赴美、德、意进行宣传,揭露日本侵华经过及其残暴事实。但这种短期行为远不能满足抗战的需要。1938年2月,国际宣传处派前美联社驻华记者李复赴纽约筹办中央宣传处驻美办事处,开始筹划国际宣传网的设立。1939年,国宣处上海支部、香港支部、伦敦支部分别扩大为办事处。1941年7月,国宣处驻新加坡办事处成立,同年9月,仰光

¹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二四(2)宗70卷。

办事处亦成立。这两个办事处与香港办事处是国宣处在远东布置的三个据点，其主要任务是增强中英两国在远东的联络，推进国宣处对缅甸、南洋地区的宣传，联络中外报纸及驻在地的外国记者，办理宣传品外递与宣传材料内输并监视敌伪、中共的宣传活动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的国际宣传组织以重庆为中心，以上海、香港为联络站，以纽约、伦敦为国外活动中心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香港、新加坡、仰光等办事处先后关闭。国民党又在加尔各答、新德里、悉尼各设一办事处，重新布置了宣传网。在整个抗战期间，国宣处先后在国外设立了 12 个办事处，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洲、英国、印度、法国等国家和地区。

国宣处在外国设立的这些办事处与所在地的民间团体广泛建立合作关系，组织演讲，出版报刊和宣传小册子。1938 年 4 月，香港办事处创刊《战时中国》(China at war)，香港沦陷后，该刊于 1942 年 1 月起在纽约印刷发行，从未脱期。1939 年 2 月 1 日，国宣处所属益世海外通讯社在比利时创刊法文周刊《中国通讯》。纽约办事处成立不久即成立了泛太平洋通讯社，至 1939 年年底该办事处就与美国 140 个民间团体、12 家美国宣传机构取得合作，1941 年 5 月又创办英文半月刊《现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同年 6 月泛太平洋通讯社改组更名为中国新闻社(Chinese News Service)。至 1943 年 2 月，该办事处又设立演讲部，同年 10 月 1 日成立广播部，进行了大量的新闻宣传。上海办事处利用公共租界这一特殊的环境也搞了大量的对外宣传活动，自成立起至 1940 年 3 月共发行 3 种日刊、4 种周刊、1 种半月刊、4 种月刊共计 12 种定期对外宣传刊物，其中英语 7 种、法语 2 种、俄语 1 种、日语 1 种、世界语 1 种。加尔各答办事处也在印度刊行英文周刊《中国通讯》和印度文周刊。在材料的输送方面，国宣处与美国的一个业余专家合作，建起了一个收音站，重庆方面每天都有 5000 至 1—2 万字的材料输送过去，该收音站抄下后再用电报打字方法送往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办事处。纽约办事处再负责航空分送国宣处驻其他各

国的办事处。这样，国民党在海外布置的国际宣传网相互之间就可以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并可以随时接受重庆方面的指导而不受海上交通中断的影响。

国宣处还与外国广播电台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相互交流广播节目。先后与重庆方面建立联播关系的有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 10 多个电台，其中有 BBC、CBC、NBC、CBS 等在国际上较有声望的电台。1942 年中国国际电台对美国播送特别节目 151 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互助广播公司等转播成功 109 次。这些外国电台将重庆方面的节目代为传播，使中国之声遍布四方。

1942 年 1 月 6 日，经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国宣处处长曾虚白等人的积极奔走，“反侵略国家联合宣传委员会”在重庆召开成立会议。中、英、美、澳、荷等国各派代表参加，由董显光代行主席之职。该委员会每周开一次例会，其主要任务有三项：一为联系各国之宣传工作，二为交换意见与情报，三为研究与建议能够增进关系各国最大宣传效果的方法与步骤。因同盟国间相互合作的关系，国民党在国外的宣传据点，其活动更趋活跃。

二 利用外国人在各国推进宣传工作

太平洋战争前，因顾虑到美国人忌讳宣传，所以国民党极力避免采取直接宣传的姿态，而是采取间接方式，“以不着痕迹之方法转移彼国孤立主义派之观点”¹，利用外国人在各国推进宣传工作。他们自己则主要从事一些幕后活动。其目的主要在于扫除宣传痕迹，使国际间容易接受。

在这一策略思想指导下，国宣处在国外的办事处均聘请外籍人员主持。这些外籍人员熟悉当地的情况，也有一定的知名度，颇

¹ 《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 年第 1 期，第 84 页。

具号召力。如1938年2月中宣部派前美联社驻华记者李复(E. Leaf)赴纽约筹办办事处。在李复等人的努力下,“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行动委员会”宣告成立。该委员会后来又改为联合对华救济会。其所有的广播、文字、图书、小册子均由重庆方面提供材料。该委员会为援华抗日在美国各地游行募捐,举办展览会,筹集捐款,在反对美国向日本输出废铁、汽油,促使美国同情与支援中国抗战方面尽了极大的努力。其他如益世海外通讯社,社长是法国神甫杨安然,该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版一种法文月刊,由比籍神父罗文大学博士柏立德(R. P. Edouard Neud)主编,其编辑方针均遵照国宣处的指示。伦敦办事处由伦敦(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y)和上海麦伦书院校长夏晋麟主持。国宣处在国内还设有四个办事处,分布在昆明、桂林、西安、成都。其中1940年成立的成都编辑委员会9名成员均为外籍教授或传教士,由美国人毕范宇(Frank Price)主持工作。原上海办事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撤)由美国人法兰和柏兰德主持,一切重要工作均由外国人出面进行。许多外籍人员如费吴生(George Fitch)、武道(Maurice Votaw)、马彬和(Mac Caus Land)、绿川英子、长谷川照子、鹿地亘等均受聘为国宣处工作。《美晚报》主笔高尔德(R. C. Gould)也是国宣处“预定的联络对象”,他因为鲜明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而被汪伪上海市长列入驱逐名单。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就主要利用外籍人员进行新闻宣传,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代言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国际宣传由这种潜伏的状态表面化,各驻外办事处负责人也多改为中国人。但在技术方面,国民党仍借用同盟国的专家在其本国协助推行宣传工作。

三 充分利用外国记者和外国新闻媒介

在国民党间接、隐蔽的宣传方针下,如何利用外国记者和外国

的新闻媒介,使其代为宣传,遂成为一个中心的环节。国宣处精心地组织、筹划这项工作,其措施主要有三项。

1. 发布新闻会议

1937年12月1日国宣处开始举办外国记者新闻会议,截止到1941年4月,国宣处共举办外籍记者新闻会议600余次。这种新闻会议的目的主要是传达国民党中央对内对外的各项宣言,驳斥其认为荒谬的言论与消息,并由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表最近战况,会上还有国民党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发表讲话等。

新闻会议是国民党直接向世界各国表达自己意见、主张的一个重要渠道。为了很好地利用这一对外宣传的渠道,1943年春国民党中宣部、外交部联合拟订《招待外籍记者新闻会谈办法》。其草稿第二项为“外籍记者如有问题提出询问应于开会前24小时送交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汇送发言人俾得事前准备并征询主管机关之意见”。¹ 蒋介石阅后,认为这一句“不甚妥当,必为外人见笑”,建议改为“外籍记者如有专门或重要问题提出询问时应先用书面送交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汇送发言人俾得事前准备并征询主管机关之意见”。并特意嘱咐:“只可作为口头约定仍不能以此项办法见诸文字授与外国记者也”。² 为不使自己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难堪,国民党当局授权中宣部严密筹划具体办法。同年夏初,《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招待外国新闻记者及有关宣传之外籍人士办法》颁布。依据这项办法,首次会议于同年6月8日(星期二)下午3时在国宣处举行。此后,每星期二下午都成为例会时间。在遇有特殊事件时,这种会议还可随时召集。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军令部等部门各派一名负责代表出席例会。为与其他有关机构取得密切联系,宣传部函请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部、粮食部、政治部六部各派一名高级负责代表于每星期二记者会议前到中宣部与行政院、

¹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718(5)宗63卷。

²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718(5)宗63卷。

外交部、军令部代表晤谈,并将各该部本星期内要向外国记者宣传的事项及可能答复记者提问的有关材料带来,以备应用。这种晤谈一般都是在午餐前后进行的。主持记者会议的代表及其它六部代表与国宣处处长为在一起磋商对策,每星期二中午在中宣部就餐,餐后即商谈。胸有成竹之后,记者招待会便开始了。

2. 直接与外国有关机构交涉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在其国内外大造反华舆论。日本旅居各国的侨民在其国家政府的影响与指导下,所办刊物、通讯社也大造反华言论。一些外国报刊不时转载采用。这对中国的抗战宣传形成了一股逆流。为此,国民党常以官方立场与外国有关机构交涉。

1939年1月,陈炳章在出席美国太平洋协会时专程访问合众社总社,对该社经常采用日方谣言显露袒日色彩表示不满,要求该社转变态度,多发有利于中国的消息。2月份,纽约办事处负责人拜访伦敦《泰晤士报》总经理,提示该报在中日问题上采用东京、上海、重庆各方消息的比例,要求该报多用中方消息,以免袒日之嫌。该报表示愿对中日战争的新闻报道做一积极的调整。

在中国本土上,国宣处除以新闻检查法控制各外国新闻机构所发消息外,也经常以官方姿态直接对各国驻华新闻机构提出意见与要求。1939年5月26日,日本《每日新闻》盗用合众社驻渝记者名义捏造日本轰炸重庆的消息。国宣处要求该社向日方提出抗议。同年9月26日,董显光与合众社远东分社总经理毛理斯晤谈,对该社驻渝记者所发消息屡有不妥失检之处提出意见,要求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毛理斯表示同意。

1941年5月,英国大使馆提议商讨中英宣传合作办法,国宣处依据其统计的近三个月港方敌伪报刊攻击国民党中央的消息与言论及国民党中央在港自办刊物及其外围组织刊物被港方当局检查的消息与言论写成备忘录,由外交部向英国大使馆正式提出。该备忘录认为香港当局对于不利于国民党中央的宣传一贯采取放任

政策,“苟此种态度不加纠正,实无从谈合作”。¹ 英国大使馆接到这个备忘录后即与港方当局商洽,国宣处香港办事处也与之进行了非正式的商谈。港方当局表示愿意改变已往政策,并在各方面与国宣处取得了联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同盟国间共同的利益,官方合作更为便利。一些宣传事宜也更多地由国民党官方出面交涉,实行同盟国间的宣传合作。

3. 协助外国记者工作

国民党中宣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协助外国记者工作:派员引谒国民党党政军当局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派员引导外国记者参观内地各项新兴建设事业;派员陪同外国记者赴前线观察并介绍会见当地军政要员;派员陪同外国记者赴各地拍摄电影或照片;函请各地军政当局予以便利;代向军事机构请领采访证明书;核发摄影执照;为外国记者拍发电讯提供便利;设法予以生活、交通便利;尽量为外国记者新闻写作搜集材料,供其参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宣处派遣“新闻采访特派员”分赴各战区搜集可供国际宣传的资料,将这些资料用中央社电台或前线军用电台电至国宣处,由该处送检后先编送各外国记者,然后再由中央社发表。国宣处还搜集了大量的与战事相配合的各报言论、社评、特稿及关于我国抗战经验的报道等逐日写成新闻稿印送各国记者,备其发用。1942年3月2日,经蒋介石核准,国宣处一专员随同入缅远征军总部工作。其任务之一就是 will 将重要战讯尽速发至重庆,供给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使用。

国宣处不但把搜集到的各种资料尽先供给外国记者,使他们自动采用,言国民党之所欲言,为国民党宣传。而且,诸如此类的资料还被国宣处汇编起来送至国外办事处,由各办事处送给当地各报刊杂志,供其参考采用。

¹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二四(2)宗76卷。

截止到1945年4月,国宣处平均每年招待外国记者访谒政府要员及社会名流360次。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曾亲自带领外国记者乘专机前往报道“湘北大捷”,并冒着被敌军击中的危险乘飞机陪同美国报界大亨亨利·卢斯(H. R. Luce)飞赴西安采访。卢斯返美后,在其主办的《幸福》杂志第9号上特辟专栏《中国——我们的盟友》,向美国民众大力宣扬中国的抗战精神并呼吁美国增强援华。

为给予外国记者电讯交通上的便利,借外国记者之手使有利中国的消息扬于世界,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便开放部分时间专供各国记者向美国广播新闻电讯。1942年4月,交通部管理国际宣传处专务台(简称宣传处专务台)成立。该台自1941年上半年开始施工,设于国宣处防空洞内。其目的主要是便利英美宣传主管机关与其驻渝人员通讯,便利国宣处与驻外办事处联络,并尽量为外国记者收发新闻电讯。该台由交通部管理并设法与美国新闻无线电公司取得了合作。宣传处专务台发出的电报均由该公司转送各通讯社,使电报收发时间大大减少,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为使外国记者不因顾虑电报费而减少其电报字数,该台还特意降低了电报费。1942年10月3日,国际电台举办“每周新闻广播信箱”,各国记者均可每周一次免费对其所属新闻机构广播新闻一次。国宣处还设立了一个西方记者招待所,替驻重庆的外国记者解除生活上的困难。

总之,为了吸引利用外国记者,国民党设法为外国记者提供生活上、工作上的诸多便利,与他们建立起十分密切的关系,使他们能尽力为中国的抗战进行宣传。这些外国记者在抵制日伪欺骗性宣传及为中国抗战争取国际舆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 以美国为重点宣传对象

在整个抗战期间,美国一直是国民党对外宣传的重点对象。因

为美国和远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与欧洲政局牵连较少。而且，美国的一些商人为牟取暴利源源不断地供应日本石油、钢铁、机床等军需用品，对中国的抗战十分不利。为使美国停止供应日本军需品并对之实行制裁而给中国以实际援助，国民党在新闻宣传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1937年9月4日，蒋介石接见美联社记者，要求唤起国际舆论。9月12日，宋美龄在南京通过美国广播网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情形，呼吁美国支援。但9月14日，美国发表声明，声称其对中日两国仍将采取中立政策。为此，9月24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名义接见外国记者，呼吁美国转变政策。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1938年年初，陈诚、王宠惠、董显光共同拟订赴美宣传办法。办法有10项，除筹设中宣部驻美办事处外，还派张彭春留美进行宣传，聘用美国传教士毕范宇在华盛顿将中国方面宣传品广为分送，并请美国知名人士利用这些宣传品在美国各地宣传演讲；还拟从中国战区物色一批美国传教士赴美演讲中国战场的见闻，并策动美国驻汉口记者拍发有利于中国的新闻，请外国人士将侵华日军的暴行写成专著在英美等国出版等。这些办法的目的无外乎是争取美国舆论的同情，促使美国政府对日实施制裁。

1938年6月11日，美国政策终于有所改变，对日开始实行“道义封锁”，禁运成型飞机和飞机发动机。蒋介石趁热打铁，16日又电令中宣部：“设法在美国宣传中国需要物资援助之意。”

针对美国在中日问题上采取“中立主义”的政策，国民党一方面不断揭露侵华日军的暴行，另一方面又利用一切机会揭露日本称霸亚洲与世界的野心。1939年1月，蒋介石核发“争取美国制日之宣传方策建议”，并要求国宣处“对于美联社在港在沪人员尤应

¹ 《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1期，第83页。

特别联络招呼，务使发出消息，有利于我”。¹ 蒋介石自己也十分注意在宣传上拉拢美国。同年2月10日，日军占领海南岛，蒋介石认为这是争取美国制日宣传的绝好时机。第二天，他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日军占领该岛“实为完全控制太平洋海权之发轫。该岛若归日军掌握，则日本海军向西可由印度洋以窥地中海，而在东面，即可以断绝新加坡、夏威夷岛、珍珠港英美海军根据地之联络……日军之进窥海南岛等于1931年9月18日之占领沈阳；换言之，日本之进攻海南岛，无异造成太平洋上之‘九一八’”。² 同时，《中央日报》也配合蒋的讲话发表社论，声称日本此举是对美国的直接挑衅，是与美国争夺太平洋霸权，日本如在太平洋上发动战争，必首先攻击关岛、檀香山。“日本征服欧亚的凶锋，决不会避开太平洋上直接最大的海军主敌”。³ 诸如此类的宣传一而再、再而三，使英美的注意力聚焦于太平洋，使他们认识到其在太平洋的切身利益正在受到威胁，从而放弃中立政策，制日援华。英美为自身利益起见开始加强太平洋防务，准备对日作战。就在当月，美国国会通过“太平洋设防案”。4月，罗斯福总统命令在大西洋的美国舰队主力调回太平洋，以应付日本的威胁。

经过国民党的新闻宣传和外交的努力，1939年6月，美国首批援华物资卡车510辆、军布300吨到达海防内运。与援华的同时，美国亦开始采取制日措施，于7月25日宣布对日禁运汽油与废铁，次日废除了《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对此，日本声称：“苟美国仍继续采取压迫日本之行动，则两国将有发生战争之可能。”⁴

国民党则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加强与改善对美宣传。

1939年10月10日蒋介石密电董显光：“对美宣传工作应于

¹ 《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1期，第84页。

² 《大公报》1939年2月12日。

³ 《中央日报》1939年2月14日。

⁴ 《大公报》1939年9月20日。

每一时期集中一点努力,因广泛宣传颇不易得具体效果,目前对美宣传应集中于美国对日实施经济制裁一点,以期明年正月美日商约届满时美国政府能采取断然之手段。”¹为此,国宣处就要设法增加对美国民众的广播机会,使同情我国的美国报纸将远东新闻刊载于较显要地位,并增发单行本,“用美国著者或其他中立者之名义分送或贱价售与美国各大报社及有力机关或名人”。²

国宣处在国内首先强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美宣传,广播次数由一次增至三次,播音时间也增多了一倍。国宣处特约驻美收音员将播音收录后分送全美华文报纸及其他重要报纸共120家刊载,有时还特约几家电台转播。在国外,国宣处改组加强了纽约办事处,规定其主要任务就是推进对美宣传,联络美国的一切亲华团体并推动其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促使美国政府对日实行禁运军用品;联络美国上层人物,并在各地举行集会、演讲,推动侨胞工作;利用美国宣传机构和各大报刊发表宣传抗战的文章。纽约办事处在旧金山、华盛顿、芝加哥都设有分处。国民党的一切宣传指令均由国宣处发给纽约办事处,再由其分送各处。办事处成员在美国广交朋友,积极地推动美国民间的援华制日运动,使美国援华制日的呼声日见高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

国民党外交部、军令部等部门也不时将所需宣传各点函示国宣处,使国际宣传与外交、军事紧密配合起来。1940年7月14日,王宠惠、徐谟致函董显光,告他中国抗战目前最需要的美国援助有5项,即:对日实施经济禁运尤须禁运军械军火原料及废铁汽油,对日本轮船运输及其入口货施以差别待遇,开展全美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施加压力以维持滇越、滇缅公路并对中国予以财政及其他形式的援助。董显光在制定下一阶段的宣传方针时便以此为根据,集中宣传力量呼吁美国的这5项援助。美国著名报人霍华德9

¹ 《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2月,第86页。

² 《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2月,第86页。

月份适访重庆，国宣处予以安排，巧施影响，安排他与蒋介石、孔祥熙、王世杰等国民党要人会谈。霍华德返美后即撰文称赞中国抗战精神坚定，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持强硬态度。11月9日，《洛杉矶时报》发表由渝返美的史谷脱写的文章《中国迫切需要武器和飞机》。这都是国宣处围绕这一时期的宣传方针在幕后所做的具体努力。

随着此类宣传的膨胀及美日谈判的僵化、破裂，美国开始增加对华援助并对日本态度逐渐强硬。1940年3月7日，中美达成《滇锡借款协议》。同年9月25日，中美又达成《钨砂借款协议》。美国政府分别贷款2000万、2500万美元给国民政府，中国分别以锡和钨砂偿还。10月2日，美国政府决定“应以明确的行动，表示不因日本之恫吓而后退一步的坚强决心”。¹ 同年12月29日，罗斯福总统发表广播讲话认为柏林三国盟约是对美国的威胁，民主国家的政治哲学与侵略国家的政治哲学誓不两立，绝无妥协可能。

1941年7月26日，罗斯福总统下令冻结日本资产。英国、荷兰也采取了同样行动。美日间的海上交通中断了，贸易事实上也已经断绝。

但美国一方面对日实行制裁，另一方面又谋求对日妥协。1941年4月至12月珍珠港事件前夕，罗斯福总统、国务卿赫尔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举行了60多次会议，历时9个月。4月，美国政府向日本提出《美日谅解方案》，其中有两项：美国努力促使蒋政权与汪政权合并，承认满洲国。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其目的是想以牺牲中国来换取与日本的妥协，使其北进苏联，从而保护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利益。为争取美国不与暴日妥协，国民党又大造舆论开展攻势宣传。

同年5月，纽约办事处创刊《现代中国》。该刊宗旨是报道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现状并传达中国对国际间问题的主张、意见，引起美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的兴趣，导致美国舆论有利于中国，

¹ [日]古屋奎二著：《蒋总统秘录》第12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60页。

缩短中美两国人民间的“精神距离”。同年7月，国宣处正式派员驻美，主持纽约办事处工作，并改组泛太平洋通讯社为中国新闻社，由纽约办事处直接指导。中国新闻社所有关于国内的新闻材料均由重庆国际电台播送，由国宣处在洛杉矶约定的无线电专家收听抄录后送该社发表。其时效性之快，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

在宣传内容上，国民党一方面大篇幅地报道日寇飞机如何轰炸美国领事馆、美国人员的伤亡情况及日军在中国各地的暴行，另一方面又由各头脑人物发表讲话，呼吁美国主持正义。

随着珍珠港炮声的轰鸣，国民党拉拢美国制日援华以至最后参战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五 说好不说坏的宣传政策

国民党的对外宣传，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多作正面宣传，争取主动，以增加我在国际上之信誉”。¹ 他们费尽心机意图操纵外籍记者，尽量不让他们看到那些不愿让人看到的东西，尽量掩盖弊端，尽量让他们说好听的话。如果一旦发表不利国民党的言论，记者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如：斯诺因详细报道了“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取消了记者特权，被迫离华返美。爱金生、爱泼斯坦、斯坦因离开中国后因发表不利国民党当局的言论，1945年1月8日，董显光主张对他们的外籍记者执照予以作废处理。这也反映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独裁专政。

1939年4月，年仅23岁的白修德受雇于国民党中央宣部，在其中担任顾问。没过多久，他便意识到他是被雇佣来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的。“美国对抗日的支持是政府赖以生存的希望所在，而影响美国的新闻界则是迫切需要的。向美国撒点谎，骗一骗美国人，不惜一切地说服美国，什么中美两国的前途在反对日本的事业中是

¹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871页。

缩短中美两国人民间的“精神距离”。同年7月，国宣处正式派员驻美，主持纽约办事处工作，并改组泛太平洋通讯社为中国新闻社，由纽约办事处直接指导。中国新闻社所有关于国内的新闻材料均由重庆国际电台播送，由国宣处在洛杉矶约定的无线电专家收听抄录后送该社发表。其时效性之快，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

在宣传内容上，国民党一方面大篇幅地报道日寇飞机如何轰炸美国领事馆、美国人员的伤亡情况及日军在中国各地的暴行，另一方面又由各头脑人物发表讲话，呼吁美国主持正义。

随着珍珠港炮声的轰鸣，国民党拉拢美国制日援华以至最后参战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五 说好不说坏的宣传政策

国民党的对外宣传，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多作正面宣传，争取主动，以增加我在国际上之信誉”。¹ 他们费尽心机意图操纵外籍记者，尽量不让他们看到那些不愿让人看到的东西，尽量掩盖弊端，尽量让他们说好听的话。如果一旦发表不利国民党的言论，记者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如：斯诺因详细报道了“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取消了记者特权，被迫离华返美。爱金生、爱泼斯坦、斯坦因离开中国后因发表不利国民党当局的言论，1945年1月8日，董显光主张对他们的外籍记者执照予以作废处理。这也反映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独裁专政。

1939年4月，年仅23岁的白修德受雇于国民党中央宣部，在其中担任顾问。没过多久，他便意识到他是被雇佣来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的。“美国对抗日的支持是政府赖以生存的希望所在，而影响美国的新闻界则是迫切需要的。向美国撒点谎，骗一骗美国人，不惜一切地说服美国，什么中美两国的前途在反对日本的事业中是

¹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871页。